

“优势治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

萧子扬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随着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以“乡风文明”为关键旨趣的乡村文化振兴将占据重要地位,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充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从而有效缓解“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文章基于“优势视角”和“优势治理”的理论逻辑,初步探讨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这一重要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思想借鉴。

〔关键词〕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 优势治理 制度优势 优势视角

〔中图法分类号〕C916

〔引用本文格式〕萧子扬. “优势治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J]. 图书馆, 2020(4):001—007, 028.

1 问题的提出:何谓“优势治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势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比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事实上,这些显著优势不仅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也是新时代我国实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需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高度重视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组织动员、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从而使“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高度概括为13个方面,站位高远,意义重大,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2],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优势治理”的理论逻辑。

所谓“优势治理”,是“优势”和“治理”这两个概念的有机结合,具有多维度的含义,既指运用“优势视角”进行社会治理(即改变以往的“问题视角”,注重挖掘社会治理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潜能和优势,从而有效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也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从而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和能力)。可见,“优势治理”是一种具有高度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逻辑和治理模式,是对原有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超越和拓展。该概念最早由芦恒(2016)提出,他认为,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研究大多从“问题视角”入手,较少考虑社区的内外优势,导致社区治理“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较为严重,因而需要将“问题视角”转换为“优势视角”,重新挖掘组织优势、动员优势、认同优势、主体性优势等“优势资源”,从而有效创新社会治理路径^[3]。同时,张大维(2018)基于治理谱系的梳理对“优势治理”进行了明确界定,他提出,“优势治理是治理体系中政府和民众等各参与要素根据各自的优势,以最合适的身份和最优质的状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和协调治理”,因而它并不是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而是从整体层面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进行有机融合^[4],旨在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并构筑一个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5]。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虽未明确提出“优势治理”概念,

但在论述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优势时暗含了一种“优势治理”和“优势视角”的理论逻辑。比如,张瑞敏(2018)、张云华(2019)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力、动员力、执行力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独特法宝^[6-7];韩俊(2018)、刘晓雪(2018)、王振(2018)等人则认为,我国乡村振兴有着欧美国家未曾有过的机遇,也具备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8]。“有习近平总书记把舵定向,有党的领导的组织优势,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9],这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助于乡村振兴“优势治理”目标的实现。综上所述,“优势治理”模式是伴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形塑的,旨在从“优势视角”出发,不断激活社会治理对象内外部显著优势,并及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对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工作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这实际上也使得“优势治理”成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亟待探讨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

当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将其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10],并在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使得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11]。比如,截至2019年末,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累计减少了9348万人;再比如,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40多倍。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新时代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有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将从解决极端贫困问题、绝对贫困问题转向稳定脱贫、精准防贫,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当属防止因“文化贫困”而产生的大量农民“返贫”现象的发生^[12]。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乡风文明达到新的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可见,以“乡风文明”为主旨的乡村文化振兴将在2020“后脱贫时代”占据重

要地位,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需要在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从而有效缓解“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基于此,“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这一议题构成了文章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文章重点结合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和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发展情况,尝试探讨和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何谓“优势治理”和“优势视角”?它们在我国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乡村文化振兴等领域能够发挥何种价值?第二,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哪些发展困境?又拥有哪些发展潜力和内外优势?第三,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外优势应当如何激活?制度优势又如何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效能,从而加快乡村文化振兴进程?

2 既有研究和理论视角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4],不仅能形塑社会个体的精神世界、消解个人生活困顿、赋予生活价值和意义、有效规范社会行为、增强社会团结,还能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血脉,发挥着构筑国家精神、国家价值和力量的作用^[15]。其中,“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乡村文化作为我国农村全面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应当“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从而助推2020“后脱贫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等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16]。

我国有关农村文化、乡村文化振兴主题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为进一步了解2020“后脱贫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侧重从“问题视角”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历史逻辑、主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等内容。比如,刘彦武(2018)重点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律、规划、政策等顶层设计^[17];段小虎(2018)系统梳理了从“农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振兴”转变的历史演进逻辑,认为这一转变促使乡村文化研究的维度、内容、方法和思维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18];刘凤兰(2018)、高裴(2018)、范建华(2019)等人侧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导向、理论整合等功能^[19];同时,严火其(2018)、陈波(2018)、李玉雄(2019)、罗哲

(2019)等人重点剖析了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文化价值认同危机、文化基底失序等问题^[20-22]；此外，徐顽强(2018)、萧子扬(2019a;2020b)等人侧重探讨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和公共图书馆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23-25]。这也导致仅有部分学者基于“优势视角”对我国乡村文化的多元价值、潜在优势进行了探讨。比如，芦恒(2019)认为，基于“问题视角”的“乡村溃败论”“地域衰退论”等话语呈现出燎原之势，因而必须反思现代性、挖掘优势、提升“抗逆力”，从而有效应对乡村振兴的风险和挑战；萧子扬(2019a;2019b)认为，农村老年人口、留守妇女和青年等群体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具有潜在价值，应当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加以对待^[26]。可见，尽管有部分学者尚未明确在乡村振兴领域提出“优势视角”和“优势治理”等概念，但却已经逐步意识到“优势治理”和“优势视角”的理论逻辑对我国乡村振兴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何谓“优势视角”？事实上，“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重要理论，最早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Weick、Rapp、Sullivan和Kisthard等人在1989年合作撰写的*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一文当中提出。此后，Saleebey对“优势视角”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廓清^[27]。Saleebey(2016)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最佳的目标。”^[28]可见，“优势视角”是对以往“问题视角”的回应和超越，侧重强调“问题视角”不仅不能有效解决案主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增加了案主的无助感和悲观情绪，导致案主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优势视角”主张运用积极、科学的干预方式尝试和案主合作，整合案主和环境所具有的内外优势资源，发现自身和环境的价值，不断激活案主的优势和潜能，从而有效解决问题、摆脱困境^[29]。这一干预模式具有四大特色：第一，肯定案主拥有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尊重案主的独特性；第三，支持案主运用和拓展优势资源；第四，肯定案主的价值和尊严。

同时，“优势视角”通常包括六大核心概念：

①“优势”。“优势视角”认为，“体验、个人品格、天赋、感悟、故事、灵性、意义和社区资源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即可以从内外部探索案主能力提升的优势和资源；②“增权”。“优势视角”强调，必须和案主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将其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从而提升案主的能力、权利和力量；③“成员资格”。“优势视角”认为，成员资格是身份、权利、参与的象征，如果案主没有获得相应

的成员资格，则极有可能陷入“被边缘化”“被异化”“被压迫”的尴尬境地；④“悬置怀疑”。“优势视角”认为，以往视角容易产生“专业霸权”，通常将案主置于被动、不合作的境地，对案主的能力和主动性持怀疑态度，并将某些干预理念强加于案主，导致负面影响产生，因而需要采取“悬置怀疑”的策略，和案主建立一种基于信任机制而形成的新型专业关系；⑤“抗逆力”。所谓“抗逆力”是指人们的自我纠正取向，是一种弯曲而不折断或弯曲之时能够反弹的能力。“优势视角”认为，激活案主的内外优势是形塑和提升其“抗逆力”的重要来源；⑥“希望”。“优势视角”旨在提升案主面向未来的情绪和感知能力，以促使他们在面对各种逆境和挑战时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充满希望的状态^[30]。

综上所述，“优势视角”既能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也能为“优势治理”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的形塑和拓展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及时运用“优势视角”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从而促使“以制度优势服务于我国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路径得以有效落实。

3 “悲”“喜”浑成：我国乡村振兴的困境和优势

3.1 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虽然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发展和建设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和文件，既注重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注重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显著提升了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水平，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即城乡文化的一体化、农村文化教育的均衡化、农村文化载体的多元化等。但是，“农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这一基本事实毋庸置疑、不容忽视，它实际上是我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的突出短板，因而需要正视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和挑战。具体如下：

3.1.1 农村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意识形态建设既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助于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序发展。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总体上保持了一种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

错误思潮在我国不断渗透,并向农村地区扩展,使得新时代我国农村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表征:其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农村地区有所弱化。由于受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一些西方错误思潮从城市渗透到农村,导致部分农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逐渐淡化,也使得部分基层干部思想懈怠,甚至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现象;其二,部分农村的陈规陋习、低俗恶俗文化泛起,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天价彩礼、盲目攀比、封建迷信、聚众赌博等现象在我国农村地区层出不穷,不仅导致农村社会风气恶化,也阻碍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进程^[31]。

3.1.2 “贫困文化”蔓延,农民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权利缺位

一方面,“脱贫攻坚重在精神脱贫”,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贫困文化”现象,这是我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工作需要重点应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所言,“饱受贫困压力的弱势群体为了应对无处不在的贫困状况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可见,长期受到贫困文化影响的人极有可能产生一种甘于贫困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使得贫困人口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受到严重束缚,也容易导致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从而促使农村贫困问题加剧;另一方面,由于贫困文化在我国农村的蔓延,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有学者强调,“农民理应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推动者,然而由于受教育问题、乡村文化式微以及文化生活匮乏等原因,农民沦为文化的旁观者。”^[32]这也使得我国农民在文化价值观的表达、公共文化资源的享受等方面比较弱势,甚至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面临着主体性不足和话语缺失的现状。

3.1.3 公共文化空间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事实上,“农村文化的发展需要较为健全和完善的物质载体作为支撑”,这使得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二者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民参与文化活动、提升文化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场所和载体,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空间价值,而且还能够促进农村文化发展、增强农民的“乡镇精神”和村庄归属感、认同感。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基层政府的重视程度不足,我国农村面临着公共文化空间利用率低、被挤占等情况;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相较于城市地区而言尚存在较大差距,使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这也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文化的发展。

同时,也正是由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文化发展情况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即东部地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发达,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老少边穷”等深度贫困地区则更为严重,可能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3.2 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所具有的显著内外部优势

结合“优势视角”来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四大显著的内外优势,具体如下:

3.2.1 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在优势

农村地区拥有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在优势。“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农村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村庄布局、建筑形态、农事活动、民间艺术、民俗活动等方面均彰显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国农村传统文化并没有过时,对于解决当下的社会发展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效用,因而不能忽视我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单纯地将农村当作是城市的附庸,不能片面地认为乡村文化是落后文明,更不能采取“城市文化取代乡村文化”这一简单粗暴的发展方式。总之,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农村拥有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优势资源。

3.2.2 乡村文化振兴的动员优势

由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使得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较强的动员优势。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始终发挥着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也使得我国能够集中各方面力量,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高效执行、有力推进,从而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一优势在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建国以来,在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基础上^[33],我国文化发展迈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全新时代,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比如,1993年12月,我国成立了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增强致富本领,并推动“农家书屋”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可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文化的发展。

3.2.3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优势

由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使得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优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同时，党的十九大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文化需求也与日俱增，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从而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多样的文化需求。总之，“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为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性优势，从而有效激活农村文化发展的潜能。

3.2.4 乡村文化振兴的政党优势

由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使得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根本性的政党优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最大、最显著的制度优势。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民族复兴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等奋斗目标。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我国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堡垒作用，既可以引导和监督农村文化发展、建设等工作，也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文化发展领域的引领、示范地位；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有效保证我国乡村振兴、文化扶贫等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性和方向性。

4 何以可能：优势视角下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为有效促使乡村文化振兴进程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必须及时运用“优势

视角”和“优势治理”等相关理论逻辑，对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所具有的内外优势进行深入剖析，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效能，进而形成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文化“优势治理”发展路径。

4.1 坚持“优势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为保证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优势治理”模式得以有效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优势治理”的基本原则，从而促使“制度优势”在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得以充分彰显。事实上，“优势治理”模式着重强调“优势”“制度优势”的价值，要求运用“优势视角”进行社会治理，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这实际上为我国制度优势的发挥划定了基本原则，即“制度意识”“制度权威”“制度执行”是关键内容。因此，为促使制度优势有效服务于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强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意识。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保持高度的自信，并在充分了解我国制度优势来源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使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助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第二，要积极维护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权威。建国70多年来，我国农村文化工作取得了不小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强大优势，这也构成了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因而有必要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权威予以维护。第三，要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执行力”，因而为有效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的制度优势，必须加强文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的作用，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

4.2 继承和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优势

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优势和重要资源，能够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和优势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言：“在讲‘贫穷’的同时，不要忘记讲闽东的光彩；在讲压力的同时，不要忘了讲动力……什么是闽东之光呢？……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34]可见，尽管我国农村地区依然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等

发展困境和压力,但是也需要看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道重要的“光彩”,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为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一个抛弃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因此,为有效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应当注重挖掘传统村落文化、村寨文化的价值,加强对我国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其次,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可行空间,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模式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35];最后,注重发挥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的作用,促使农村传统美德能够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4.3 注重激活文化主体性,保障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的基本权益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必须来自广大农民,只有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and 主动性被充分激活,乡村振兴才有可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关键在于激活我国农民的主体性,这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也不例外,因而必须注重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激活,充分保障农民在农村文化方面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有助于推动农村文化工作的开展,进而促使农村文化实现大繁荣、大发展。因此,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等目标,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鼓励农民参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文化旅游、文化扶贫等相关的文化活动,从而有效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和参与积极性。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措施:其一,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建设等方面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创新和丰富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从而有效满足农民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其二,积极推动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尝试通过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等外在力量介入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形成多元合作的文化治理格局;其三,加强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创新我国乡土文化,并以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动力,进一步铸牢乡村文化振兴的农民主体性。

4.4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

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可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的重要原则,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事实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农村落地生根的需要,也是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需要。因此,为有效推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农村地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文化扶贫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农村文化扶贫、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三,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积极推动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和,并及时开展移风易俗行动,进而有效促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4.5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兴办乡村文化振兴工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破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劣势困境的独特经验,是中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法宝”。历史经验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显著优势之一,能够加速推进我国乡村振兴进程。因此,为进一步加快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必须充分挖掘“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农村文化发展当中的显著优势,围绕乡村文化振兴的共同目标,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和优势,并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从而有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领域的“通力合作”。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各方面的工作,逐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有效构建一个系统完备的乡村文化振兴体系;第二,积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进一步推动“文化兴边”“文化扶贫”“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有效保障我国各项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当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视野,汇聚更为广泛的力量,进而为乡村文化事业的发

展和建设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总之，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应当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促使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5 结语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不是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简单相加……而是政府、农民等参与要素各显优势、有效衔接的优势治理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需要及时运用“优势视角”加以分析，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从而促使我国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模式得以形成。因此，笔者基于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和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发展情况的理解，创新运用“优势视角”和“优势治理”等理论逻辑对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主要优势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当然，为有效促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优势治理”目标的实现，确保我国制度优势能够更好地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效能，还应当进一步探讨以下内容：

第一，“优势视角”和“优势治理”存在何种差异？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嵌入？事实上，“优势视角”和“优势治理”在理论逻辑方面有较高的相似度，但也略微不同，因而需要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差异，从而促使“优势视角”理论和“优势治理”模式能够在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发挥更为明确和显著的作用。

第二，在促使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效能的过程当中，应当建立何种评价体系和评估机制，从而确保制度优势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当中的实际作用和效能？

（来稿时间：2020年1月）

参考文献：

1. 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6.
2. 刘光明.在深刻认识显著优势中坚持制度自信[N].人民日报,2019-11-14(13).
3. 芦恒.后单位社会的“历史连续性”与基层社会的“优势治理”——基于东北棚户区改造后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6(6):51-56.
4. 张大维.优势治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与乡村振兴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8(1):66-72.
5. 张大维.优势治理的概念建构与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政府与农民有效衔接的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19(7):88-96.

6. 张瑞敏,龙梅.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独特法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23-127.

7. 张云华,伍振军,周群力,等.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调查与启示[J].开放导报,2019(4):7-11.

8. 王振,齐顾波,李凡,等.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本土化优势——基于对发展主义的反思[J].贵州社会科学,2018(4):163-168.

9. 韩俊.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J].管理世界,2018(8):1-10.

10. 萧子扬.“治贫术:重访民国时期柯象峰的贫困治理思想——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9-27.

11. 韩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十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5-40.

12. 萧子扬.农村社会保障社区化:2020“后脱贫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20(2):106-115.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94-200.

14. 李鹏程.文化研究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7-308.

15. 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J].东南学术,2018(5):132-137.

16. 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J].中国领导科学,2018(2):91-95.

17. 刘彦武.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政策演变及展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8(3):123-128.

18. 段小虎,闫小斌,荆皓.从“农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维度与思维模式的转变[J].图书馆,2018(9):1-4.

19. 李凤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基于日常生活理论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8(7):11-17.

20. 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125-127.

21. 严火其,刘畅.乡村文化振兴: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的契合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46-51.

22. 罗哲,唐逸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29-135.

23. 徐顽强,于周旭,徐新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困境及对策[J].行政管理改革,2019(1):51-57.

24. 萧子扬,刘清斌,桑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2):224-232.

25. 萧子扬,叶锦涛.公共图书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内在契合和主要路径[J].图书馆,2020(2):46-52.

26. 萧子扬.失落的“老农”: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农政史

(下转28页)

28.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6.
29. 李锡鹤. 民法原理论稿[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479.
30. 齐爱民. 捍卫信息社会中的财产: 信息财产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0-102.
31. 陆小华. 信息财产权: 民法视角中的新财富保护模式[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61-373.
32. 郑佳宁. 经营者信息的财产权保护[J]. 政法论坛, 2016(3): 165-175.

Re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Data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Zhang Li

(The Civil &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brings the new right of data, and the big data paradox is being verified one by one.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the key to breaking the paradox is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rights. The latest judicial practice of data rights protection exists outside the territory, and the existence of data rights is also theoretically justified. Investigate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the data rights system in the comparative law, and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legislation in the one-way protection framework for personal data. Based on this, China should build a complete data right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ghts attributes, that is, data rights include data personality rights and data property rights. The contents of data personality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nspection rights, correction rights, deletion rights, portability rights and storage rights; data property rights include control rights, usage rights, income rights and disposition rights.

[Keywords] Data Data rights Data personality rights Data property rights

[作者简介] 张黎(1976—),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上接7页)

考察[J]. 学术探索, 2019(3):57-65.

27. Saleebey D. 优势视角: 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19-23.

28. 张和清, 杨锡聪, 古学斌.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 社会学研究, 2008(6):174-193.

29. 孟洁. 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理论内涵探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55-64.

30. 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第2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7:227-242.

31. 文丰安. 错误思潮对新时代农村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应对[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6):135-144.

32. 黄爱教. 从文化旁观者到参与者: 乡村振兴的文化权利及其实现[J]. 新疆社会科学, 2019(1):96-102.

33. 郑有贵.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跨越发展的法宝[J]. 人民论坛, 2019(13):26-27.

34.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19-22.

35. 萧子扬, 马恩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乡贤研究: 一项文献综述[J]. 世界农业, 2018(12):76-80.

“Advantage Governance”: How Do System Advantages Serve the Promotion of Rural Culture

Xiao Zi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ost-poverty Era” in 2020,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with “township civilization” as its key purpose will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cultural need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inadequate supply bal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advantage perspective” and “advantage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preliminaril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issue of “how do system advantages serv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ideolog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 Rural 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dvantage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Advantage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 萧子扬(1997—),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社会治理。